

# 安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创新利用〔\*〕

孙超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安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具有技术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历史价值和生态价值。安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创新性利用的五大要素为:技术文化研究要素;合理性探究;产业业态转化要素;旅游化生存;农业提质要素;产品品牌;文化传承要素;文化记忆;生态发展要素;互利双赢。

〔关键词〕安徽;农业文化;遗产;利用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6.018

## 一、传统农业文化有何利用价值

农业文化是我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活动的创造和生存智慧的结晶,是传统农业的精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价值。中国是世界农业的三大发源地之一,作为百业之源的农业,在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生产经验,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不同地域产生了稻作文化、粟作文化、游牧文化,形成了中国农业文化特有的内涵,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诸特征。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从秦汉以至明清,历代统治者都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如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业文化类型,是具有充分理由的”。<sup>〔1〕</sup>就一般意义来讲,世界文明和文化发生的类型,都脱离不了农业这一基

础,但从文明的持续性、文化的影响性来看,世界农业三大发源地,仅有中国的农业文化体系被传承了下来。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往往把传统农业作为中国文化的产生土壤或行业的基础,长期的农业历史形成的农耕文化、农技方式、农村习俗等是组成农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孟子·滕文公上》所谓:“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就是对农业文明和农业社会文化特征的写照。从当代发展的趋势来看,与中国传统种植业相关的知识具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用较少的耕地养活众多人口等突出的优点,农业文明是一种有机的文明(特别是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人们运用人之勤,顺应天时地利,追求天地人物的整体统一,在农业生产

作者简介:孙超,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文化。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村生源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编号:AHSKY2014D85)的成果。

的基础上,孕育了与此相适应的文化。

农业文化主要指:历史上在农业生产领域和农村生活领域,由人们创造并保存下来的各种知识、技术、观念、制度、习俗以及各种物质资料等资源的综合,主要通过农业遗产体现其内容。按照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概念的一般解释,农业文化遗产与过去的农业遗产不同,农业文化遗产更注重遗产的“活态”性,即在农村农业发展中保持着发展活力或潜力的各种农业系统、农业物种、生产技术、农业景观、生产习俗和文化观念等资源。“从外延上看,它大致包括农业遗址、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聚落、农业技术、农业工具、农业文献、农业特产、农业民俗10个方面”。<sup>[2]</sup>可将农业文化遗产范围扩展为聚落类、遗址类、工程类、景观类、工具类、技术类、文献类、物种类、特产类以及民俗类等十种类型。总体看来,安徽农业文化遗产类型多样,数量众多,资源丰富,且不同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分布差异,各地域遗产资源文化风格不一。这些遗产资源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经济、生态及文化价值。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农业资源极为丰富,在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转型和跨越中,研究、挖掘、传播、利用安徽农业文化遗产,对于传承农耕文化、保护农村生态、发展生态农业、拓展农业功能、建设美好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与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一样,农业文化遗产也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类型丰富、遗产表现多样,具有生态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和技术文化价值等方面。<sup>[3]</sup>

## 二、安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分析

安徽农业生产历史悠久、特征鲜明,早在远古时代就留下了农业生产的痕迹。从农业遗址来看,目前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三百多处,安徽境内繁昌县癞痢山人字洞已被专家确认为亚洲年代最早的农业文化遗址之一。蒙城县尉迟寺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

社会新石器晚期农业聚落遗址。

长期的农业发展,特别是兼容北方、南方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安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数量极多,种类齐全、遗产类型多样、地域分布差异明显,遗产资源文化类型和体现风格也不一样。从农具来看,安徽农业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农具丰富多彩,按照质材分有铁、木、竹、麻(棕)等四大类;按用途分有耕整、播种、收获、脱粒、加工、灌溉(提水)、运输等多种;具有特色的有旧石器时期的砍砸器、新石器时期的石铲和石斧、汉代的灰陶井沿和绿釉陶磨、清代的脚踏碓、明代的织布机和民国时期的二人脚踩龙骨水车。长期的农耕生活中,使农具得到不断的创新、改进和完善,种植业、渔业、养蚕养蜂、运输、生产保护等各类工具发明,充分显示了各地农民的生产智慧。从农业工程遗产来看,安徽境内水系众多,水资源在年际间、季节间和地区间分配不均,常对生产造成危害,于是自古就修建了一系列抗御水旱灾害的水利工程。安徽工程类农业遗产以寿县芍陂(安丰塘)为代表,多应用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中。全省各地域分布了大量的运河闸坝、堤坝和农田灌溉系统,如安徽黟县的漏斗坝灌溉系统充分体现了山区人们发展农田水利的创造性智慧;此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位于潜山县境内的三国时期水利工程吴塘堰与乌石堰,含山县境内的铜城闸等。安徽《地方志·农业志》记载:长江流域修建圩堤数量安徽也最多,汉代以迄民国达1973个。从养殖物种来看,“槐山羊”是已有1000余年历史的古老品种,优良黄牛品种皖东牛,至少已有500多年的养殖历史,《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官给牛、种、舟、粮,以资遣之,仍三年不征其税,于是徙者凡四千余户”。淮猪是我国古老的地方优良品种,早在公元前3世纪《博物志》中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明嘉靖《庐江志·货殖篇》中就已经把巢湖鸭列为家禽之首。在作物种植方面,亳县钓鱼台考古遗址发现了大型陶鬲内盛有大量的碳化小麦籽粒,距今最少已有4000多

年,南陵县葛林遗址 13 号土墩,发现西周晚期的碳化稻谷。从农作物特产来看,地方优良品种砀山酥梨已有 3000 年栽培历史,至少 400 年前,砀山酥梨已形成种植规模,明万历修编的《徐州府志》中就有“砀山产梨”的记载。产于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的夹沟香稻米,历史悠久,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留有:“唯有流沟山下寺,门前依旧白云多”的诗句。从农业景观来看,休宁板桥流水养鱼景观已有千年的历史,2013 年休宁板桥乡荣获安徽省“山泉流水养鱼之乡”的称号,2015 年“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被农业部列入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黟县宏村水口林、休宁新安源古林公园景观、金竹岭黄山贡菊景观都已成为乡村旅游的新亮点。从农业民俗来看,池州傩戏汇蓄和沉淀了从上古到近代各个历史时期诸多文化信息,涉及多种学科、多个领域,隐藏着博大精深的文化蕴涵和极高的文化人类学、戏剧学、宗教学、美术学、历史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学术研究价值,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民俗仪式,被称为“最古老、最完整”的古戏曲之一。“安苗节”是皖南农村诸多农事活动中最富有特色的习俗,节间人们多以新麦面粉做包糍当餐,谚云:“种田种得哭,享个安苗福”。邻里互相品尝包糍,山间小村亲友亦赶来过节,同享口福,其间交流生产经验,议论稻田管理、水利等意见与措施。

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分布于封闭的山区。贫困山区土地资源短缺,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创造性地因山就势开发利用土地,形成了多样化的土地利用类型和有效性的资源管理、多样性的资源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内容,包括农耕文化及与系统密切相关的乡村民约、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民间传说、歌舞艺术以及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等,维持了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sup>[4]</sup>优秀的农业文化是劳动人民长期生存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价值,保护、传承、发展好其中重要的农业文化遗

产,对于现在以及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安徽省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启动,作为系统性的农业文化遗产,安徽“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有寿县芍陂(安丰塘)及灌区农业系统、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铜陵白姜种植系统、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2016 年,安徽普选出淮北相山黄里笆斗杏种植系统、黟县石墨茶文化系统、绩溪金山时雨茶文化系统、寿县古香草园、寿县梨树栽培系统、寿县八公山黄豆种植与豆腐文化系统、杜集葡萄栽培系统和烈山石榴栽培系统等八个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项目,同时,分布于广大农村的零散性、可挖掘性的农业遗产资源也非常丰富。

当然,安徽在保护利用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对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度不高,相对于安徽文化资源大省和文化强省建设,我们在农业文化遗产利用上相对滞后,全省进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的只有 4 项,2016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安徽省普查工作推动的深度和实施成效均不够,安徽省进入全国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名录(408 项)的只有 8 项。另一方面,安徽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还处于文化观光型阶段。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利用率低,开发内容较为单一,相应的文化产业、产品的吸引力有待提高,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力度也不够,现有的遗产项目在改造、开发和利用方面也不够科学,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特殊性质的认识缺乏全面性的把握,包括遗产的活态性、多功能性,特别是对濒危性、可持续发展性的准确理解,还有对遗产分类和具体评价还比较模糊,研究开发利用人员应具备的传播技能也不够,导致对农业文化遗产理解、宣传不到位。

### 三、安徽农业文化遗产创新性利用的要素分析

#### (一)技术文化研究要素:合理性探究

一般说来,古代农业是指从新石器时代与铁器时代交替时期起到 19 世纪后期为止的农业,

从社会形态来看,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的这一阶段。中国的古代农业(一般也称为传统农业)可以说是古代农业文明一个典型的代表,其中尊重农时、精耕细作、选用大量原始的品种资源、丰富多彩的技术经验、注意用地与养地、利用有机质循环、保持生态平衡等农业生产思想和生产技术,被世界各国用来厘清对现代生态农业的认识,纠正用单纯的工业文明来规约生态农业的发展思路,并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考和认识依据。

“传统技术思想”不同于“古代技术思想”。能够成为“传统”的东西,并不是古已有之而与今无关的东西。“传统”的东西产生于过去,但能够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还将影响未来,这样才称得上“传统”。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如何体现特色?十多年来,在理论界和技术现实运用中谈及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持续农业”等概念越来越多,呼吁运用的也越来越强烈。特别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现代农业集约性、功能多元性,启动城乡融合发展等实践中,对减施化肥农药、建设生态农业、实行农业的综合经营、提高作物的利用转化效率、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等方面,国家和地方都采取了政策层面、制度层面、实际实施多方面的措施,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如何更加深入地探究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中的融入的中国技术要素,突显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从最基础的技术文化角度,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思想加以系统探究,亦是必要的。那么,对优秀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技术文化研究层面,关键是要探究隐含在其中的本土知识和技术,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技术和农业文献中丰富的思想,自然是探究中国传统技术文化的“宝库”。当然,在研究中需要汲取各类资源之精华,剔除其中糟粕,系统探究传统技术文化的科学性所在,及其在当代的技术文化中合理的适用范围有多大。“这样的本土知识和技术尽管其适用范围必然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局限,但却标志着特定人群

与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之间和谐共荣关系的可持续潜力,因而也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吸取的精神财富。”<sup>[5]</sup>

几千年来,安徽人民在农、林、牧、渔、蚕、茶、农田水利、农业管理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思想和生产经验,拥有众多的农业典籍。4000多年前,尧舜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大禹带领民众,“疏江导河”,“决汝汉,排淮泗”,“始于霍山,回集五岳”,留下导山治水之伟绩。大禹治水的成功,促进了原始社会末期农业生产的发展,懂得顺应水的特性用疏导法治理洪水,并有了原始灌溉的农业。管仲的农学思想和孙叔敖主持修建的芍陂(安丰塘)工程,反映了安徽人民早在2000多年前,已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揭示自然的规律,推动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西汉刘安《淮南子》记录了我国古代农业气象、水利灌溉、农业机械、蚕桑等方面宝贵的农业生产知识。《淮南子》体系周全,内容丰富,特别在农业节气、物候、气象、水利、农具、农药以及农产品加工等方面,都有最早的记载和发明创造,是安徽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其中,涉及农业民俗类的有我国最早的二十四节气划分及完整的理论表述,“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说山训》)是世界上最早的测知空气湿度的农业技术方法。而流传至今的传统豆腐制作更是已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淮南万毕术》中所述的用硫化砷燃烧灭农田害虫,可以说是最早的农药使用的记载。《淮南子·地形训》论述了中国主要河流水质及其宜种植的作物,“河水中浊而宜菽”“雒水轻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江水肥仁而宜稻”,意思是长江水清润不伤作物,这种水适宜浇灌水稻。数百年后,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提到“上稻要引上流清水”,和《淮南子》所述观点是一致的。

#### (二)产业业态转化要素:生长新城

当前安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主要体现在旅游化生存、产业化发展模式上,主要形式是各遗产地利用遗产资源,融合发展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等新领域。从现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可行性上看,“旅游化生存与产业化发展”是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性保护和有效利用的最可行之路。<sup>[6]</sup>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遗产地各级政府更进一步盘活遗产资源,积极探索开发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的新路径,让农民切实受益。如何让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为农业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首先,旅游化生存方面,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能够被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成为以拓展农业功能、传承农耕文化、体验田园乐趣为主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设成为具有科普、教育、学习、体验等功能的休闲农园、农旅项目。安徽作为农业大省和粮食大省,长期以来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农业综合生产效益仍然较低,《安徽省“十三五”种植业发展规划》提出推进产业融合,促进农村一、二、三级产业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国家级、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点)创建。提出利用种植业资源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项目,主要通过农业“接二连三”、农产品加工业“接一连三”、休闲农业“接二连一”和信息技术“接三连二加一”,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收链。

其次,在产业业态转化中提升综合生产效益。农业遗产的“活态性”要求这种遗产在现实生产中要继续使用,既有生存价值又有发展要素。新产业、新业态是现代生产技术及管理要素与传统的农业农村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和创新的产物,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可以形成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产业融合来看,农业与文化产业、农业与旅游业相互联系已经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从功能拓展来看,农业本身正在发挥和创造着越来越多的生态、文化、旅游功能和价值。乡村休闲旅游是以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等自然和人文客体为基础,依托农村自然生态景观、传统民俗建筑、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活动、特色农业产业、农村手工艺等特色资源,以农村休闲游和农业体验游为基本形式,其间通过农业文化遗产资

源形成产业叠加拓展生成了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养生养老、康体娱乐、文化教育于一体的新兴旅游方式。同时,由政府主导,通过社会组织的社区营造,农业文化系统也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得到定向性的利用。

### (三)农业提质要素:产品品牌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经营就能致富,才是我国乡村振兴的基础性标志。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推动地方名优特农产品提档升级、做大做优,明确了要以市场为导向,紧跟消费需求变化,充分挖掘具有地方历史、地理和文化特色的品牌价值,并较为精准地给予了以其为引领推动农产品由规模化生产向优质、专用、特色生产经营转变,形成独特的市场优势和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发展框架。在质量兴农部分,乡村振兴战略又强调了: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把品牌化和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并列为农业发展提质的重要驱动要素。

当前,我国农产品区域品牌研究、建设可以说方兴未艾,但从建设效果来看,建设的视野和成效较为单一和不足。农产品品牌化建设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总是不相适应,步伐落后或步调不一。从产业化的角度来看,农产品建设总是习惯采用传统产品品牌培育的相关模式,忽略农产品主体特点和众多产品形成的资源禀赋,从而适用性较差,建设和拓展的空间较小。从经营化的角度来看,在农产品品牌的培育方面,很多经营者绞尽脑汁,投入效果不如意,品牌效益优势不强,农产品品牌同质性、分散性现象严重,同一区域一品多牌比比皆是。其重要原因是农产品品牌建设忽略了产品生成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是自然性、地域性的生产环境和生产习惯所致,更来自于产品生成的文化特质。用文化培育农产品,把优质特色文化,融于农产品

良好的品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能进一步加大农产品品牌的表达能力,显现农产品的差异性,提升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接受度,激发他们潜在的文化消费需求,自然,农产品品牌的影响力与竞争力也随之加强、扩大。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在品牌构建上需要作出主动性适应,在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中,结合科技创新、质量标准、生态安全,注入文化融合机制,为区域农产品品牌构建增添更多机会与可能。

我国历史悠久,许多地域文化资源丰富,目前,有91项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有1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与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一样,农业文化遗产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价值,安徽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数量极多,种类齐全,类型多样。充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多种价值,可为农产品品牌发展储备巨大的可利用资源。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技术体系的交互作用在当代能产生巨大的“产业文化”推动力,乡村振兴中文化产品理应成为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项新兴产业。传统技术文化所承载的知识获得方式、思维模式、民族心理、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等,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各类文化产品之中,如地域农产品、农事活动、农具以及各类“农家乐”采摘活动、渔猎活动、烹饪技艺等。

#### (四) 文化传承要素:文化颜值

农业农村是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之源,农耕文明同样也是中华文化之重要载体。可以说,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农业,离不开了解中国农耕文化。要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更不能忽视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农耕文明活化的载体,对进一步深化爱国家、爱民族情怀,都有着重要作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其时代内涵、丰富其表现形式。如何能使发展和保护形成耦合,达到双赢?

首先,农业文化遗产地是展示传统农业历史辉煌成就的窗口,浓郁的民族习俗与地域特色,

促进了文化农业、休闲农业的发展。农耕文化及与系统密切相关的乡村民约、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民间传说、歌舞艺术以及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等,丰富多彩,维持了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农村地域文化特色的深化上,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其次,作为乡村文化重要内容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具有转化的现实优势,能够服务“产业—生态—人文”一体化发展,为开展“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区域农产品品牌文化建设提供动力,使文化成为乡村的凝聚力、生产力、驱动力。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正是借助文化遗产资源,迅速提高茶叶及精深加工产品生产、休闲、旅游、生态体验等方面的经济功能,形成茶叶种植、加工、贸易、文化旅游四位一体的产业体系,“茶王祭拜”“开园仪式”作为每年太平猴魁开园采摘前的重大仪式,展示出了百年传统猴魁茶文化与当今市场文化的相结合,让古老的太平猴魁茶焕发出了青春活力。再次,乡村文化的持续发展和文化振兴的根本实现,需要以文化提升生活品质、拓展发展空间,也就是塑造“耐看的文化颜值”。乡村振兴若没有文化做支撑,那就很难振兴,因为没有内涵,缺乏灵魂。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中根植于乡村的文化生态、原汁原味的古村古屋、农味土味的饮食、原生原真的农俗农器,都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记忆,是最有吸引力的文化创意和品牌建设要素。安徽部分农业文化遗产地结合特色农业文化之乡的申报、审核和命名,实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建立特色农业文化博物馆、科普馆、展览馆等,开展特色农业文化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代表性文化的宣传、展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用文创思维重新认识、激活、塑造乡村,让农产品戴上历史文化的桂冠,披上饮食文化的名片,携手民俗文化的载体。在乡村文化旅游方面,体验农业也发展迅猛,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让消费者置身农业景观,细听农产品的起源、发展的精彩故事,体验农产品生产过程,品尝饮食佳肴,分享农产品的民俗文

化,继而打造更多乡村文化产业的卖点。

#### (五)生态发展要素:互利双赢

作为以复合性、可持续性、多功能性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其复合性、可持续性同样也发挥着重要生态与环境价值,实现生态宜居的乡村生态振兴目标,处理好乡村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首先,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中,农业遗产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遗产资源的可持续性要求,不言而喻地需要农业生产系统具备良好的生态条件,这种良好的生态条件为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提供了环境保障。从发展保障来说,农业遗产地也需要加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进一步完善生态系统保护制度,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在推进芍陂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中,地方政府完成安丰塘北坡、西坡环塘水利工程绿化和安丰塘景观带建设,完成《芍陂农业水利文化遗产构成及价值研究报告》《芍陂农业水利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芍陂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书》等申遗的编制,芍陂水体保护、环境整治、水利景观展示等工程,实现了遗产地更大范围的生态保护。其次,农业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其多功能性也愈加成为生态农业新业态的生成形式,比如农业遗产地农产品,包含丰富多彩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具有良好的生态与环境质量,成为发展特色生态农产品的资源优势。铜陵“白姜文化”2017年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遗产品牌的影响和对生产的促进来看,铜陵市2017年的白姜种植面积为3500亩,亩产约2600斤,每斤均价在7至8元之间,2018年又新增了不少白姜种植户,不少姜农靠种姜脱贫致富。目前,铜陵白姜种植面积达

4000多亩,总产量达600余万公斤。从政府支持来看,为了保护铜陵白姜传统的优良品质,除了要求种植户按照铜陵白姜种植工艺操作、施用有机肥料外,铜陵市农业部门、财政部门每年还会安排50万元专项资金,对白姜种植户实施有机肥料补贴,以促进产业绿色发展。再次,良好生态环境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点,将生态系统保护、资源持续利用贯穿于农业绿色发展之中,可以说是乡村绿色发展必由之路。比如以生态旅游推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农业文化遗产地拥有独特的地形地貌,遗产地特有的民族、农事、文化资源,为开展生态旅游、民俗旅游和体验旅游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sup>[7]</sup>产品开发与生态旅游均需要市场化主体企业的广泛参与,借助旅游带动特色产品销售,借助特色产品开发丰富旅游内容,将是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 注释:

[1]张岱年:《序》,邹德秀:《中国农业文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2]李明、王思明:《多维度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构成研究》,《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

[3]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的五大核心价值》,《农民日报》2014年1月17日,第004版。

[4]李文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9页。

[5]杨庭硕:《本土知识的发掘在农业文化遗产认证中的参考价值》,《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6]王德刚:《旅游化生存与产业化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式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7]童玉娥、徐明:《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建议》,《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刘 鑫]